

# 库珀对霍桑作品叙事歧义性特点的分析 ——以《拉普西尼的女儿》研究为例

钱晶晶<sup>①</sup>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 美国学者爱伦·库珀对霍桑著名短篇小说《拉普西尼的女儿》的研究, 体现出文学分析中使用语言学语篇分析方法的意义。库珀提出: 作者用叙述者身份的歧义化达到特殊的评议效果, 用一系列象征性的表达揭示理想与现实能否共存的主题思想, 用间接的表达方式传递对主人公的强烈情感。库珀的贡献在于指出霍桑叙事语言的歧义性特点, 并通过解读这种特点透视作者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 库珀; 《拉普西尼的女儿》; 语篇分析; 歧义叙事法

在浪漫主义这一极具个性特色的文学流派里,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在其浪漫主义的作品中糅合人文主义、超验主义、女性主义、神秘主义等元素, 显得别具一格。我国文学评论界对其创作已有不少评论, 然而, 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思想内容切入, 角度比较单一。美国学者艾伦·库珀 (Allene Cooper) 在 “The Discourse of Romance Truth and Fantasy in Hawthorne’s Point of View” 一文中, 通过从语言学语篇分析的角度阐释小说《拉普西尼的女儿》中的叙事手法, 试图从对语言构架的破解说明霍桑常用的“模棱两可”歧义叙事法对 19 世纪文体发展的贡献、对现实和理想能否共存的探索以及隐藏的对女主人公的深切同情。<sup>[1]497-507</sup> 库珀的研究隐含语篇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观点, 把语言学的方法运用到了文学研究中, 对我们研究霍桑的创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库珀首先解释了霍桑的歧义叙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通常, 在小说的叙事手法上, 传统的处理方式都是从叙事者视角展开。在语篇分析学中, 根据拉波夫的叙事分析模式, 一个完整的叙事语篇应具有六个部分: 点题、指向、进展、评议、结果或结局、回应,<sup>[2]147</sup> 而对于小说、戏剧、电影等文学作品, 进展和评议是最重要的部分。<sup>[2]157</sup> 进展, 不言而喻是叙事结构中的核心部分; 而评议在整个

叙事语篇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它代表叙事者或其他人对某种情况的看法、态度等,<sup>[2]148</sup> 而看法和态度无疑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表达起决定性的作用, 它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鉴赏。正是由于这一点, 霍桑在《拉普西尼的女儿》的创作过程中有意地制造叙述者身份上的歧义, 使读者无法确切得知是谁在担当进展和评议的工作。在阅读的过程中, 叙述上的歧义使读者如同置身于一个现实世界与理想王国的中间地带, 使故事发展显得更加精致、更加微妙, 从而使故事情节更加引人入胜, 促使读者有强烈的欲望要透过扑朔迷离的情节探索作者的实际创作动机和故事的中心意旨。<sup>[1]497</sup> 这一点是对 19 世纪文学叙述方式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阅读这篇作品时, 读者时常会为故事的情节及其叙事方式所迷惑, 有种“似谏似真真不知”之感。这一点在表现女主人公碧特丽斯时尤为典型。比如, 在男主人公吉奥瓦尼 (Giovanni) 第一次看到碧特丽斯 (Beatrice) 时, 首先听到她父亲拉普西尼叫她和回答的一段简短的对话:

Beatrice ——— Beatrice ‘Here am I, my father! What would you?’ cried a rich and youthful voice from the window from the opposite house, a voice as rich as a tropical sunset and which made Giovanni though he knew not why think of deep

① 收稿日期: 2007-11-14

作者简介: 钱晶晶, 女, 江苏扬州人,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2006 级硕士研究生。

hues of purple and crimson and of perfumes heavily detectable<sup>[3]650</sup>

这里是全文第一次正面描写女主人公碧特丽斯。一般作家的正常做法都是从叙事者的角度花大量功夫详细描写她的外形特征。霍桑则不然,他并不急于描写碧特丽斯的面容如何娇美、衣着如何华丽,而是先用对话的形式让她出场,让作品有一种“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感觉,对她留下深刻的印象,紧接着,就站在一个“貌似”吉奥瓦尼的视角上,用评议性的话语浓墨重彩地评价她的声音,“评议可以用来制造悬念,提高听众的兴趣,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sup>[2]148</sup>在评议中,霍桑用生动的比喻突出其声音的美妙,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官冲击。

然而,这个先声夺人的效果和别致生动的比喻都只不过是叙事法的铺垫,问题的关键是读者在读完斜体字的几行后的感觉——他们无法获知:到底谁觉得碧特丽斯的声音“as rich as a tropical sunset”?对于这个问题,霍桑自己并不表态,<sup>[1]497</sup>似乎一切都是客观事实。是叙事者对她的声音有这种感觉,还是吉奥瓦尼这样认为?如果是叙事者,那碧特丽斯的美就是既成事实,应该作为文章的基本情节;但如果是吉奥瓦尼这么看,那效果就有了细微的差别。“读者一定会问:‘吉奥瓦尼的看法正确吗?碧特丽斯真的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吗?’”,<sup>[1]498</sup>进而对故事情节和两人关系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好奇和关切。

库珀自己还举了一个例子,也是关于碧特丽斯的:

Giovanni had not considered with himself what should be his deportment, whether he should apologize for his intrusion into the garden, or assume that he was there with the privy at least if not by the desire of Doctor Rappaccini or his daughter. But Beatrice's manner placed him at his ease, though leaving him still in doubt by what agency he had gained admittance. She came lightly along the path, and met him near the broken fountain. There was surprise in her face, but brightened by a simple and kind expression of pleasure.<sup>[1]498-499</sup>

故事情节本来已经够曲折的了,作者使用的歧义叙事法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感觉,使得全文的形式和内容一起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色彩。在这段话中,到底是谁认为碧特丽斯“came lightly ar-

long the path...her face, but brightened by a simple and kind expression of pleasure”?是吉奥瓦尼的看法,还是作者纯粹的动作描写?谁认为她“simple and kind”?是男主人公、作者,还是读者?<sup>[1]499</sup>在文中,读者无法看出问题的答案。霍桑就是要通过这种叙事身份上的歧义和模糊达到为下文张本的目的。这既不是福楼拜的“无人称叙事”,也不是亨利·詹姆斯的“距离叙事者”,而是一种新的叙事模式——“歧义叙事法”。<sup>[1]497</sup>作者经常在一些不为人觉察的、看似细枝末节却是叙述的关键点上有意制造模糊,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无形中为下文表达主题铺垫。

第二,在其创作生涯中,霍桑曾明确说过他一直在探索一个永恒的主题:现实与理想能否共存?他认为:这一点很难实现,或根本就不能实现。<sup>[1]506</sup>在《拉普西尼的女儿》中,他通过充满象征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美好事物的关切,寄寓内心的强烈情感。对于“理想”与“现实”这两个意象,他很少直接表现,而是通过歧义、双关等表达方式来间接传递,以暗示自己的探索过程和预测的答案。

在这篇故事里有很多不同的、看似独立的意象,如著名植物学家拉普西尼的女儿碧特丽斯、独在异乡求学的吉奥瓦尼、碧特丽斯经常游玩并精心照料的那个充满艳丽而有剧毒植物的花园等等。在文学作品里,这些事物具有的强烈象征性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联想。然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读。库珀认为:“就像作者或读者很难在现实和小说中保持平衡,吉奥瓦尼也很难与碧特丽斯在这个花园里共处”,<sup>[1]501</sup>一语道破故事的两位主人公所负载的文学内涵;碧特丽斯、吉奥瓦尼、花园三者,甚至还牵涉到拉普希尼、巴格尼奥尼等这个故事里的众多人物一起构成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象征图式:天真、美丽、纯洁一碧特丽斯无疑代表着理想,花园、她父亲、懦弱的情人吉奥瓦尼、还有她父亲赐予她的防御外界的毒性都可以代表丑恶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使她失去了幸福,她是理想与现实斗争的牺牲品。

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当然希望能看到故事如童话般终结,但霍桑不是在撰写王子和公主的美丽传说。通过浪漫而离奇的故事情节,他想让读者明白什么是现实。理想虽然美好,在现实面前终究要以悲剧收场。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在这个故事里,霍桑让

读者看到象征理想的碧特丽斯被活生生地毁灭,他想让读者知道:理想与现实抗争,往往就是这个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引出了一个后来的文学样式:现实主义,从而赋予这种象征手法以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

既然无法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求得中立,既然理想不能向现实妥协,那答案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库珀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对于他的女主人公,霍桑非常喜爱和同情,而这种强烈的情感又是通过一系列间接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在文中,他需要揭示碧特丽斯的内心世界,而他又“使用歧义来限制读者对于故事人物的思想意识的认识,但吉奥瓦尼的除外”。<sup>[1]499</sup>在这一过程中,库珀注意到霍桑突然转换叙事角度,变成从碧特丽斯的认识出发,使读者突然瞥见她的内心世界,加强表情达意的效果:

Beatrice with a quick spirited sense immediately felt that there was a gulf of blackness between them, which neither he nor she could pass... But her faith in his tenderness reassured her...<sup>[3]664</sup>

库珀指出:在故事发展到最高潮、最富悲剧性的那一刻突然把她的心理活动推向前台:在如此震惊、如此悲伤的情况下,她还能对吉奥瓦尼满怀柔情,这一描写,使得“读者突然对她产生强烈的同情”,<sup>[1]500</sup>领会作者的意图,达到预期的效果。在这里,库珀强调了全文感情色彩最强烈的一部分:

... if they should be cruel to one another, who was there to be kind to them? Besides, thought Giovanni, might there not still be a hope of his returning within the limits of ordinary nature, and leading Beatrice—the redeemed Beatrice—by the hand? Oh, weak and selfish and unworthy spirit, that could dream of an earthly union and earthly happiness as possible after such deep love had been so bitterly wronged as was Beatrice's love by Giovanni's blighting words...<sup>[3]665-666</sup>

显然,斜体部分不可能是出自吉奥瓦尼,也不可能出自碧特丽斯,只可能出自作者:他对丑恶的现实在这里的代言人吉奥瓦尼那懦弱、自私、不值一提的灵魂进行愤怒的声讨,对这个在女性夺人

的美和剧毒的恐惧中摇摆不定的懦夫进行无情的鞭笞。在追求、探索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性时,霍桑站在中间地带。但是,“在表达个人情感时,他不再模糊”,<sup>[1]506</sup>他对女主人公那种强烈的同情毫不保留地喷薄而出,从而赋予文字以强烈的感染力。在这里,歧义叙述法又在反衬意义上派上了用场,在作品丰富的想象、精巧的构思、瑰丽的语言之外的另一个层面上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并在无形之中引导读者跟他、跟他的女主角一同欢笑、一同悲哭,作品的主题云开日现,使整个故事于童话故事般的铺陈中表现作者浪漫的求真、求爱、求美之心和对理想命运的深切关怀。

库珀通过深入研究,主要得出三方面的结论:第一,霍桑通过故意制造叙述者身份的歧义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样式来吸引读者,对19世纪文学创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二,通过在篇章表达中制造模糊感,霍桑试图在创作中达到一种处于理想和现实的中立状态,但通过他的实践探索发现这通常是无法实现的;第三,尽管方式隐晦,但读者能清楚地感觉到作者对女主人公的深切同情继而得出与文章主题有关的线索。库珀的发现,首先就是对用语言学知识分析文学作品的一个成功尝试,通过在语言层面进行分析,他探索到作者创作的深层次思想动机,举例生动具有代表性,说理清晰自然,为多角度文学分析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 参考文献:

- [1] Cooper, Allene. The Discourse of Romance: Truth and Fantasy in Hawthorne's Point of View [M].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28, 1991(4): 497-507.
- [2] 黄国文. 语篇分析概要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3] Hawthorne, Nathaniel. Rappaccini's Daughter [M] // ed. Nina Bayon.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Norton, 2003. 647-67.

(责任编辑: 黄声波)